

文化双方监视自身提供了良好视角,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批判的思路。在赫勒看来,马尔库什对现代性文化悖论的论述是合理的,起源于现代性两种逻辑的悖论是文化的根本存在方式,因此也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可以寻找一种方式弱化、钝化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既保留了文化的这种特殊方式,又为不可调和的双方找到共存的方法。这种有效的途径就是文化话语。在这种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中,通过交谈真正体现了机会均等的观念。通过文化话语的交谈,每一种文化代表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所坚持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话语是特殊性的、差异性的、个体性的,因此不需要存在一个被所有人都认同的共识性基础。虽然马尔库什与赫勒所提供的理论对策存在差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发现布达佩斯学派现代性文化理论的共同诉求,那就是通过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通过主张一种多元发展的道路,避免文化走向文化单一化发展的现代性危机。

(巨慧慧 摘)

20世纪俄罗斯哲学的主要派别

《俄罗斯哲学》2015年第3期刊发了A. A. 古谢伊诺夫的文章(安启念译)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三个决定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哲学在俄罗斯发展的主要哲学派别、传统,即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俄罗斯宇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决定了俄罗斯哲学的特色,并且在决定职业性的智力工作和对广大社会团体施加哲学影响的基本方向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三个传统有着明显的重大的区别,它们相互批评、互不承认,但它们也有某种共同之处,这就是着重批判个人主义,追求一种集体主义的、聚和性的(сопр? ыт)理想,在这种理想中,个人利益直接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并依赖于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则依赖于人类利益。人类利益最终表现为全部哲学思考的目标和出发点:俄罗斯宗教哲学设想宗教统一,前景目标是恢复神人类的统一,如索洛维约夫所想的那样;俄罗斯宇宙主义宗旨是改造宇宙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以回应人的全部希望,首先是满足其对永生的渴望(即实现作为人的自然状态的不死,像H. Ф. 费奥多罗夫的乌托邦所设想的,让一切已经死亡的人复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全人类的兄弟般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所有这三种不同的从哲学上给出社会改造前景的可能方案都做了尝试:索洛维约夫的派别以宗教——精神为基础考察了对社会的改造;宇宙主义试图通过改变、再造人的自然来改造社会;马克思主义则试图通过社会改变,改变社会关系的形式来改变社会。在第一种情况下哲学诉诸人的生命的精神方面,在第二种情况下诉诸人的自然存在,在第三种情况下诉诸社会条件,它们是建立某种从哲学上描绘的人类幸福未来的三种形式。

(巨慧慧 摘)

俄罗斯借路中东突破西方封锁

毕洪业、杨辉在《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4期撰文指出,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美欧对俄罗斯的政治孤立、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也持续加码,再加之石油价格暴跌和卢布大幅贬值,一系列因素的叠加使俄罗斯经济很快走向衰退,压力之下,俄罗斯开始积极寻求外交突围,中东地区被作为重点方向。一是全面深化与伊朗的合作,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对叙利亚政府、哈马斯及黎巴嫩真主党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借助与伊朗关系的深化来增强在中东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就成为俄罗斯重返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得到全面深化,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能源领域合作加深、经贸领域的合作更加丰富;二是主动拉近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专注于自己外交的独立性,一直致力于谋求实现大突厥文化影响下的“世界强国”梦想和确立作为连接欧亚桥梁的枢纽地位,正是基于此,土耳其成为俄罗斯中东外交的一个突破点,俄土两国经济特别是能源关系密切,双边贸易额超过300亿美元,俄罗斯保障了土耳其约60%的天然气供给,而且还帮助土方建设首座核电站,俄罗斯在当前的困境之下拉近与土耳其的关系在战略上更加有利;三是适时提升与埃及的关系,埃及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中东地区都有着重大影响力和重要战略地位,在美国宣布暂停对埃部分援助和军事交流的背景下,埃及开始向外寻求认可和支持,而俄罗斯也希望借助俄埃关系来恢复在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地位和应对西方的压力,因此,军人背景的新政府对美国政策的调整为俄罗斯加快重返中东提供了机遇,而普京也适时地抓住时机推动双边关系快速升温,两国就加强在反恐、军事、投资、能源、电力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一致,此举无论对于俄罗斯摆脱当前的孤立现状,还是增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琦 摘)

“对华国际”在中国与东欧关系中的作用

马细谱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撰文指出,1967年依据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苏东各国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和毛主义”的国际委员会,即“对华国际”,用以协调对华政策,扩大反华舆论阵地。这个组织起初从讨论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发展到分析中国的经济、外交、文化等问题,从整个苏中关系扩大到整个苏东集团与中国的关系。“对华国际”的活动由苏联共产党牢牢把控,成为攻击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开始“解冻”。为了阻止这一趋势,苏联试图利用“对华国际”形成反华阵线。但是,此时大部分东欧国家都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改革或完善经济体制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

引领下,中国围绕着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关注、学习和借鉴东欧国家改革经验和教训。同样,东欧国家也在考察和了解中国,并对苏联的对华政策产生疑虑,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和行动,部分东欧国家还突破了苏联的反华防线。“对华国际”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机器运转不灵,有的年份甚至没有举行例会。中国在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宣告“中国人民对东欧其他各国人民也怀有友好的感情。我们关心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我们相信,通过共同的努力,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是可以继续改善的。”这表达了向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实行开放政策的愿望,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对华国际”不仅没有完成反华目标,反而成为东欧各国了解中国的平台。1986年,罗满宁退休,“对华国际”从此销声匿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巨慧慧 摘)

毕苏茨基与德莫夫斯基对苏联的认识

邢媛媛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撰文指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军事和经济相对薄弱的波兰似乎还不能够实现独立,也无法适应大转折期的国际政治,而且还受到了领土划界和强制推行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的双重威胁。作为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毕苏茨基和德莫夫斯基不谋而合确立了对“复兴伟大的波兰连同其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大片土地上优先影响力”的追求。双方同时看到了建立伟大新波兰的可能性,坚信波兰将取代俄罗斯成为欧洲东部和中部政治博弈的主要力量。毕苏茨基将布尔什维克的西进看作主要问题,出于战术考虑,他赞成建立联邦的思路,而德莫夫斯基则认为带有危险性的联邦体制在未来有利于德国而非波兰。毕苏茨基希望保障波兰的安全,使其不受“红色”俄罗斯的干扰,但他也不打算与对波兰毫无承诺的“白色”俄罗斯结为同盟。因此,他期望俄罗斯能够接受建立在罗曼诺夫帝国遗迹之上的民族国家,能够接受以增强波兰地位和承认乌克兰独立为基础的东欧重组。德莫夫斯基也注意到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波兰独立的意义,但他对这一事实的评估完全相悖于毕苏茨基,他意图在苏联体制中寻求波俄彼此不解的元素即意识形态上的不调和元素,并认为波兰必须要加快波兰同苏联之前签约的步伐。

(杜娟 摘)

中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

马强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入中国和俄罗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它在政治和社会场域发酵,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已经发生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两国的政

治工具。在中国,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入形成的一场社会运动为中国文化版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们都聚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下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国家逐渐承认、重构社会领域民间文化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议题,民间文化、传统文化被主流价值观污名化的境遇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到来而改变;在文化领域,国家与社会博弈的方式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来到而成为相互协商的机制。在俄罗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并没有在社会领域掀起波澜,国家政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倡导文化自觉、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宣扬爱国主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和政治实践。与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解决国家—社会紧张关系不同,俄罗斯要解决的是国家—民族、中央—地方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为俄罗斯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自觉创造了机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和有限的实践中,联邦政府保护通过立法、建立统一的名录、举办全俄范围的展览、展示等,努力将各民族文化纳入到国家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实践符合俄罗斯文化是由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现实。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在内的“新俄罗斯思想”被认为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在俄罗斯民族民间文化中有着最为生动的体现,可谓之当代俄罗斯最可宝贵的“遗产”。

(孙琦 摘)

中国与波兰的马克思主义

胡业评、吴绍鑫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撰文指出,对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波兰失败了而却仍在中国进行着”这个复杂的问题,不存在单一的或非黑即白的回答。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许多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及法律等等。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和波兰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尽管波兰共产党宣称并希望建立起一个具有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波兰共产党从来都未能发展起来类似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的波兰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哲学上而言,都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国家的无形的传统文化,即价值观和德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两国的命运都分别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得以取得成功,其条件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被加以理解和诠释的,继而,在中国的土壤中贯彻和应用,与产生出中国文化的特定的中国国情相融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取得成功,需要的是“中国化”。通过对中国和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史的比较研究,得出的启示是必须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些动力源泉进行研究,如何为当今所发生的现实找